

后冷战时期

国际
政治
重大问题聚焦

丛 鹏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98 3264 4



后冷战时期

国际政治 重大问题聚焦

丛 鹏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重大问题聚焦 / 丛鹏主编.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4

ISBN 7-5600-4722-X

I. 后… II. 丛… III. 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0476 号

出版人: 李朋义

策 划: 范明贤

责任编辑: 邓杰

封面设计: 潘振宇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

书 号: ISBN 7-5600-4722-X

定 价: 12.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序

盛世则百业兴。二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和社会全面进步，国内科学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具体门类，国际政治学科从教学到科研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国际政治学界新人辈出，各种论著频频问世，且不乏鸿篇巨制，展现出一派广阔的发展前景，让人不胜欣喜。

国际政治研究，旨在揭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因此世界各国政外交、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交往活动，即为国际政治这门学科的直接研究对象。由于这些研究对象并非是静止的，所以动态性研究乃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国际政治研究的问题大多又都与国际政治行为体的现实活动有关，因此更具有实时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国际政治研究本身所固有的这些特点，使国际政治研究工作者拥有了广袤无垠的研究空间，大有用武之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对外关系，各种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

十几年过去了，综观国际风云变幻，虽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接连不断，“热点”问题难以解决，但人民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仍是国际形势发展的主流。对此，我们认为，从事国际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员理应将后冷战时期

的重要国际问题“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这就是编著《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重大问题聚焦》一书的基本考虑。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重大问题聚焦》一书在内容上涵盖了当前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本书研究题材广泛、学术和知识含量较高，基本上勾勒出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概况。希望它不仅可以作为国际政治专业各类学生的学习参考读本，而且能够成为所有对国际问题或国际知识感兴趣者的理想读物。

参加本书写作的作者大都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国际问题或国别问题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中不少人是从教数十年并有很多科研成果的学者。全书结构和写作要求由范明贤和丛鹏策划设计，并由丛鹏对全书进行了最后审定。

本书的出版得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校内外的一些同仁也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丛 鹏

2003 年 12 月 3 日

理 论 问 题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演进

王明进 何宗强

国际关系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欧洲“三十年战争”以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才由此成为西欧普遍的现象。而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但从其源头来看，让·博丹的现代主权理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卢梭的势力均衡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克劳塞维茨的国际冲突观、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都为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论战：一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二是行为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论战；三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在这些论战展开的同时，也不断有非主流的或曰批判理论在不断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发起挑战。冷战结束后，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冷战结束的原因等问题上的乏力，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渐走上前台，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些论战的基础上，国际关系理论才得以不断发展。下面以历史演进的角度来对百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一简单的梳理。

一、第一次大争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1. 理想主义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国际关系理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①一战之后，国际政治的研究形成一股热潮，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纷纷涌现。学者们关注的中心是如何构建新的安全体系以防止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由于他们的主张表现出一种超脱现实、超脱实际政策需求的思想倾向，他们关注的主要不是如何呈现历史上和现存的国际关系，而是提出一些普通人思考逻辑范畴之外的大范畴，如国际体系是什么，它如何运行，怎样使之更好地实现和平与秩序的长远目标等，因而这些主张被称为理想主义或空想主义。

理想主义思想源于洛克、边沁、康德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合作、和平与进步。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1）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向好的方向发展。（2）战争的出现不是人类的必然产物，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人类可以逃脱追求权力的欲望，安全困境是可以超越的。（3）利益是可以调和的。国家之间尽管存在矛盾，但矛盾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不是来自人的本性。（4）国际机构、国际法和公众舆论都是保卫和平的有效手段。理想主义学派理论的代表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提出的国际理想主义和国际联盟的思想。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和平纲领“十四点”方案，认为达成世界和平的主要手段是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加强联盟与国际组织。

一战之后，由于建立了国际联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有了实验的场所，也使人们对和平充满了憧憬，增强了人们对永久和平

^① 联邦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奥托·泽姆比提出1919年5月30日为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日。这一天，出席巴黎和会的英美代表同意在各自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机构，以推动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

的预期心理，从而使理想主义主导了最初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①这一时期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从国际和平、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及其相互作用来进行国际关系的研究。这一时期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理想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有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兹默恩、贝里、菲利普·诺尔贝克、大卫·米特兰利，美国的杰姆斯·肖特维尔、比特曼·波特和帕克·穆恩。

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中的理想主义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理想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初形态，它使国际问题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因而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第二，理想主义有很多观点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具有重要的价值，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难以舍弃的。例如，这一学派的学者强调普通民众的作用，他们认为维护世界和平需要民众的支持，国际问题研究要到民众中去。理想主义学派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可以调和的，这一观点也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实所证实。他们对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文明”等问题作了广泛的涉猎，从覆盖面和论述角度上都超过了前人。但是，本世纪前半叶的理想主义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它把握国际事务的准确性不强，它“只讲世界‘应当’怎样，而不研究世界是‘怎样’”。^②它对现有的和未来的国际关系的渴望，依据的多半是自己的期望，或者社会中个别利益集团和力量的追求，而不是眼前的过程和发生的事件，不是政治的需要和国家的利益。也就是说，理想主义对国际社会美好的假设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因而这一时期的理想主义又被称为空想主义。

2. 现实主义学派的兴起

一战后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理想的空想，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英国人爱德华·卡尔发表《二十年危机》，

^① Fred Halliday,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IR: Some 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Conclusion”,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oday*, 1995.

^②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1919—1939》，成为现实主义崛起的主要标志。其主要功绩在于它击破了曾经处于正统和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教条和神话。全面奠定现实主义学派理论基础的是美国人汉斯·摩根索于1948年推出的巨著《国家间政治：争取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比较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还有乔治·凯南、阿诺德·沃尔弗斯、亨利·基辛格等人。

现实主义有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综观现实主义理论著述，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1）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的特征。与理想主义者相反，现实主义者一般都倾向于认为人性是恶的。由此出发，他们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冲突的关系。而作为人的集合体的国家，人性恶的表现甚至比在个人身上的表现更加明显。（2）主权国家是世界政治的最主要的行为体，其他任何国际行为体都不可能取代它，试图通过建立国际机构来维护国际和平是一种幼稚的想法。（3）国家被认为是根据自我利益行动的相似单位，国家的内部特征对国家的外部行为不具有决定作用，从而批判了理想主义试图通过扩展西方的价值观念而实现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4）国家是理性的，国家就像市场中的行为者一样，总是追求权力的最大化。（5）国际社会不存在合法的权威，因而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行为的自助特征。国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自我保护。^①

对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摩根索指出，“现代政治思想的历史，讲述的是这两大学派在有关人性、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第一种学派相信，产生于普遍有效的抽象原则的某种理性和道德的政治秩序，可以在现实中奏效。它以人性的善良为前提，责备社会制度在建立理性标准上的失败，相信教育制度、改良方式和偶尔使用武力能够医治各种社会痼疾。而第二种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 658.

学派认为，世界产生于人性固有的暴力倾向，从理性的观点看它必然是不完美的。为了改善这种世界，人们必须学会与各种武力打交道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们。在利益对立、彼此冲突的世界上，道德原则决不可能充分实现，它充其量是通过利益的暂时平衡和冲突的不稳定协调得以表现。后一种学派在制衡的体系中发现了适用于所有多元社会的普遍原理，它求助的不是抽象的美妙的言辞，而是历史的经验和智慧；它寻求得到的并非绝对美好的好处，而是不那么糟糕的现实结果。后面这种注重人性真实和历史启示的学派，名字就叫‘现实主义’”。^①

在反对理想主义者有关国际合作和协调一致的期望时，现实主义唤醒了人们对充满冲突和无秩序状态的国际现实的重视。与理想主义的“世界进步观”不同，现实主义学派强调的是国际政治循环发生或重复出现的“铁的规律性”的事实。与理想主义关于“权力政治不过是可怕的旧世界旧时代引导国际关系的一种方式”的论点相反，现实主义坚决认为权力政治属于一切时代国际生活的通用法则。它反对把既往的国际关系看成是“人性的进步”或“道德的不成熟”的观点，相反，它根据古典政治学的传统把国际政治研究重新定位在“权力与利益”的坐标上。

现实主义注重对国际客观环境的分析和研究，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做出了贡献。它是迄今为止分离并集中研究政治行为中的一个关键变项——权力——并提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最重要的尝试。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试图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其广度大大超过了前人。现实主义者还创建了一套规范性理论，并特别为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行动规则。现实主义除就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外，还就政治行为提出了大量的命题，对这些命题可以运用其他的框架和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②

^①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in Stanley Hoffman (ed.),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60, Prentice - Hall, Inc. pp. 54—55.

^②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就缺陷而言，首先，现实主义人性恶的观点使其倾向于把国际冲突绝对化，从而否定了国家之间可能进行合作的一面。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存在的。^①其次，传统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主体以外的各种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主体内部的各种复杂因素，要么完全忽略，要么低估其存在和影响。第三，现实主义的强烈的政策倾向也使其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行为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者看来，过分的政策偏好，不利于研究领域的“层化”和“细化”，无助于学科本身的进步。

二、第二次大争论：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 行为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经济经过战后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和应用。在人文和科学领域，都在尝试运用新科学新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行为主义方法。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这里所谓的“行为主义”是从现代心理学中借用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一种观察个人或动物等有机体在外界刺激下或既定的环境中的表现或反应的学说。这种学说强调有机体或其他各种组织的有规律、可观察、可计量的甚至能够重复操作的各种证据的重要性，认为研究的任何最终结论都不能脱离这些证据而先验地存在。因此国际政治领域的行为主义就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主义者把传统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称为传统的或古典的理论，反对它们的历史的或哲理的研究方法，认为“传统主义者只是在重复以往的内容，像一台留声机老是在放一张旧唱片”，^②而提倡实证的或实验的研究方法，强调用不同的方法或几种方法的结合，如：态度调查、

^①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5 页。

^②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92 页。

内容分析、模拟和对策、确定统计中的内在联系、构造模型以及定量分析和计算机应用作为精确性测量的基础。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卡普兰，其代表作是《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作者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系统理论。

行为主义或科学主义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科学主义的宣传、推广和运用，国际政治学在西方终于脱离了旧式的规范阶段，走向了实证研究、真正分析阶段。行为主义对历史主义的挑战主要是方法论上的革新，这是它的主要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挑战是成功的。

但是科学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也暴露了其缺陷。第一，行为主义并没有战胜或取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范畴，如国家中心说、自助概念、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状态理论、权力均衡思想等，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行为主义者”只有方法，缺少理论。第二，从方法论本身来看，行为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有先天不足。科学主义往往特别强调程序、数据、系统、变项等“铁的事实”和“实验室”效果，使原先不重视计量的学者在归纳自己的论点时变得比较谨慎和严谨，使分门别类的研究更多更细。但是，它同时可能使研究人员变得比较机械，缺乏灵活性，尤其是当科学至上论者把他们的观点和命题绝对化时，这种机械性造成的损害可能更加严重。第三，尽管相当一些人批评了传统的“非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但他们的论述和批评表明，他们自己还是缺少真正的科学研究中所需要的容忍性、相对主义和互补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论战有明显的地域界限，被称为“美国学者和英国学者之间的论战”，原因是在英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夭折了。^①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局限性。

^①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 Basil Blackwell Ltd. , 1985 , p. 140.

三、第三次大争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又开始了第三次大争论，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

1. 新现实主义的兴起

70 年代初，现实主义学派受到了来自多个方面的攻击，如行为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全球主义学派或跨国主义学派和激进派。面对这些攻击，现实主义迫切需要进行自我更新。斯坦利·霍夫曼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现有的战略，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① 到了 70 年代末，现实主义学派重整旗鼓，在“新现实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了反击，并逐步恢复它昔日的支配地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肯尼斯·沃尔兹及其著作《国际政治理论》；斯蒂芬·克莱斯勒及其著作《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罗伯特·塔克及其著作《民族间的不平等》；罗伯特·吉尔平及其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等。

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又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对于新现实主义的内涵，只有通过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比较才能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1）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即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结构体系，这是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新现实主义所展示的是一幅国际政治的系统性画面，国家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国家势力对比的变化会引起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的相应变化。（2）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在

^① Stanley Hoffmann, “Re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1985.

两者眼里是不同的。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性’的政治家就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认为是目的本身。新现实主义则不同，它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力量软弱会招致攻击，力量强大则会使对手不敢发动进攻。力量过于强大则可能刺激其他国家，使它们增加军备并联合起来对付它。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①（3）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不同。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相互作用着的个人和国家那里寻找原因，从个人和国家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后果中寻找原因。新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考察则结合了单位和系统两个层面，未来的结果取决于国家的动机，也取决于国家活动于其中的国际体系的结构。^②（4）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中剔除了传统现实主义一些不可证实的具有哲学意义和社会内容的概念，而力图使其理论成为一门科学。例如，认为权力斗争是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产物，而不是人性的结果。

总之，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尽管世界结构是无政府的，国家谋求自我保存和增加其权力不可避免，但国家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有时候国家会选择谈判而不是战斗，因为合作可以避免高代价的冲突并有利于保持和平与解决经济问题。

2.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也开始出现了。在挑战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各种自由主义的理论派别逐渐成型，被纳入了新自由主义这一框架之下。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和里查德·罗斯克萊斯等。在

^① [美] 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 页。

^② 同上，第 3 页。

新自由主义诸派中影响最大的一派是学理方面最有影响、研究议程最为严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属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畴，其代表人物是基欧汉，代表作是他 1984 年的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我们就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例对新自由主义作一分析。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基本相同，但是基欧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不能对国家的许多行为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在相同的结构条件下，体系进程也会产生重要的因果意义。体系进程的重要标志是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国际制度。这样基欧汉的主要研究议程就集中在国际制度这个概念上面，新自由制度主义因而得名。

约瑟夫·奈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1）在国际关系的角色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为中心，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角色，而新自由主义在重视国家角色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其他角色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2）在军事安全方面，新现实主义认为，对国家来说，权力、安全和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由于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可能降至次要地位，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国际合作领域明显扩大。（3）双方都重视经济因素，但是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以维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为此目的甚至可以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而新自由主义则视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同等重要，并对新现实主义的“白头”主张提出质疑。（4）在研究方法和层次方面，新现实主义主要采用体系结构层次上的分析方法，重点在体系权力的分配上，而新自由主义则是一种体系过程层次上的分析方法，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①

^① Joseph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88.

3.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趋同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大主流派别的论战在最初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但是随着辩论的展开，两者之间的区别逐渐缩小和淡化。这突出表现在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趋同上。^① 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力图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成为像物理学那样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体系，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哲学意义和社会内容被以非科学为由排除在理论体系之外。国际关系被描述成类似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个人构成的系统，或者是物理学中的场与粒子的体系。为了发展这个体系，沃尔兹必须把国家定义为单一性的理性行为体，这样国家才可能成为可以类比的“相似”单位。他也必须把国际体系定义为具有单一无政府逻辑的自助体系，这样才可能使相同的体系单位——国家——在国际体系场中从事有规律的运动。这样在结构现实主义那里，基本变量只有两个，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基本变量关系是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

沃尔兹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把现实主义发展成为具有高度科学特征的国际政治理论。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出现也正是为了回应现实主义的这一新发展。首先，新自由制度主义承认国家的理性和单一性特征，这就从根本上接受了理性主义的核心内容。其次，它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接受了沃尔兹对无政府逻辑的定义。再次，它也致力于发展体系理论，力图发现最简约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为此，它把国际制度定义为国际体系进程的基本特征，~~把~~国家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主体。这样，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成为高度简约的、呈现出高度科学性的系统理论。其基本变量~~是~~是两个：即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基本变量关系是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

这样，当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到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

^① 关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趋同，参见秦亚青：《译者前言》，[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